

# 敦煌图经中的景观与权力

王 晶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9)

[提 要]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地理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现、连动关系, 借助这种互现关系可以对P. 2005中的缺失部分以及《沙州归义军图经》进行复原。敦煌图经在修撰过程中, 增删变化突出的是两个部分, 一是官员的政绩景观, 二是地方人文景观。官员对图经的渗透作用较为明显。随着图经的不断修订, 政绩景观逐渐隐退, 人文景观得以长久存续。“图”未能全面逐一绘制“经”中的地理条目, 也无法对“经”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地图式的转写与表达。“经”彰显地方社会权力的功能是“图”无法实现的。

[关键词] 图经; 政绩景观; 人文景观; 权力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2019)02-0103-10

[收稿日期] 2018-07-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12JZD009)

[作者简介] 王晶(1986—), 女, 湖北仙桃人, 历史学博士,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敦煌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隋唐图经的兴盛与官僚制度选任变化有重要关系, 主官以及僚属不再由本地人担任, 外籍官员要在短期内尽快了解当地地理概况, 较为有效的办法就是编修地理书<sup>①</sup>。这是目前学界解释隋唐时期图经兴盛的主要叙述模式。图经是刺史了解地方社会的重要文本, 这固然是它的重要功能之一。然而, 翻阅唐代全国性的图经《元和郡县图志》, 亦可发现将刺史政绩写入图经的蛛丝马迹。譬如位于同州朝邑县北四里二百三十步处的通灵陂, 乃是开元初刺史姜师度引洛水修建而成<sup>②</sup>。通灵陂进入图经固然缘于它本身的农业水利价值, 然而类似的水利设施能够写入图经的又并不多见。刺史绝非仅仅是图经的读者。敦煌地志类文书数量丰富, 在内容、体例上与新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有很大不同。这赋予了地志类文书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敦煌地志类文书的研究非常深入<sup>③</sup>。本文以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

为中心, 从图经编修过程中的增删裁剪入手, 探

①〔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6年, 第46页; 李斌城:《唐代文化》下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652—1654页; 辛德勇:《唐代的地理学》, 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年, 第441页;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年, 第170—176页; 华林甫:《清儒地理考据研究(隋唐五代卷)》,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年, 第169页。

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38页。

③图经的录文、时间、性质、编修等诸问题得到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参〔日〕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 《檀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 (东京) 山川出版社, 1975年, 第31—101页; 李并成:《唐代图经蠡测》, 《敦煌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增刊), 1986年第5期, 第34—38页。

讨图经中人文景观与政绩景观在修撰过程中的变化<sup>①</sup>，以期揭示图经背后的权力关系。

### 一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 的复原及其分卷

敦煌图经 P. 2005 在编修时非常重视文书内部的统一性。图经的基本体例是先述纲目，再述细则，如“七所渠”下纲目有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等，“宜秋渠”下有细则曰：“右，源在州西南廿五里，引甘泉水。两岸修堰，高一丈，下阔一丈五尺。其渠下地，宜种晚禾，因号为宜秋渠”<sup>②</sup>。细则中涉及到了地理要素“甘泉水”，而甘泉水又是独立纲目，并有细则解释。细则对纲目进行解释时，尽量避免使用图经中没有涉及到的地理要素，换言之，细则中出现的地理要素都能够在图经中找到对应的地理方位。图经地理要素之间存在着连动、互现关系。现以图经中的祥瑞部分为例，按“祥瑞—地点”的方式对这种互现关系进行说明。蒲昌海—石城镇，凤凰—效谷，白雀—靖恭堂，大石立—马圈山，瑞石—李先王庙。通览 P. 2005 不难发现，祥瑞出现的地点在图经中有专门的地理单元。马圈山的方位可借助“二所堰”之“马圈口堰”确定，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廿五里，汉元鼎六年造，依马圈山造，因山为名焉。……自西凉以后，甘泉水湍激，无复此山”。同样，“效谷”可通过“嘉纳堂”定位，“嘉纳堂。……其地在子城东北罗城中，今为效谷府”。石城镇，虽然在 P. 2005 中没有存目，但在与之相关的 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中存有专门的条目。靖恭堂在 P. 2005 “三所堂”中存目，李先王庙在 P. 2005 “二所庙”中存目。P. 2005 著有“悬泉水”，而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S 5448《敦煌录》则作“贰师泉”。李正宇认为贰师泉名起于晚唐，为了突出李广利刺山出泉，士马得苏的感人事迹，淡化了泉出自半山而下的天然景观，改称贰师泉<sup>③</sup>。然 P. 2005 “一十九所驿站”中有悬泉驿，其下曰：“右，在州东一百卅五里，……奉敕移就山北悬泉谷置”。若将 P. 2005 “悬泉水”改写为“贰师泉”，在解释后文出现的悬泉驿、悬泉谷时，便颇显繁复。又 S 5448《敦煌录》亦有“贰师泉”条，细则下有云：“其贰师庙在路旁，久废，但有积石驼马，行人祈福之

所”，若改为“悬泉水”，那么细则中出现的贰师庙又无从解释了。这是图经地理要素互现现象的又一有利旁证。

关注这种互现关系，可以对图经缺失的部分进行还原。北府渠与三丈渠下提及到了“平河斗门”，据李正宇研究，平河在州城以东，故又名“东河”，东河所分支渠众多，在城东形成密集的灌溉网络<sup>④</sup>。又 P. 2005 祥瑞白龙条下有云“白龙见于平河水边”，且甘泉水下提到“东流者名东河水”，故而，甘泉水前缺条目中应当存有“东河”。一所壕堑水条下有“去城七里，投入大河”之语，大河即是指甘泉水。又阳开渠下有云“旧名平渠”，图经编修时确有叙及地理条目之别，故而甘泉水条中可补“又名大河”之语。部分祥瑞出现的地点在乡里。如木连理—敦煌乡，白雀—平康乡，五色鸟—平康乡。敦煌图经 P. 2005、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现存部分没有叙述乡里级别的内容，而 S 367《沙州伊州志》伊吾县条记载“在郭下。公廨三百一十一十五，户一千六百一十三，乡四”，同卷“纳职县”

<sup>①</sup>仇鹿鸣从碑刻入手，阐述了碑刻景观与中古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本文所使用的“人文景观”与“政绩景观”是指“图经”这种地志类体裁中所呈现的景观。刺史与图经的编修存在一定关联，他们将在任期间的政绩写入图经中，成为政绩景观。景观的增删变化，亦是指图经层面的增删，而非事实景观的变化。参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 19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79—111 页；《读者还是观众：石刻景观与中国中古政治》，《上海文汇报》2016 年 5 月 27 日；《言词内外：碑的社会史研究试笔》，《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7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39—44 页。

<sup>②</sup>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的录文可参如下论著。〔日〕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檀博士还历史纪念东洋史论丛》，第 31—101 页；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第 2—23 页；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5—33 页；王仲萃：《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109—141 页；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本文所引敦煌图经以及其它地志文书的命名、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参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一书。

<sup>③</sup>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 265、305 页。

<sup>④</sup>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 73 页。

以及散 1700《寿昌县地境》中亦记载了县下所辖诸乡的数目。地志类文书对于乡里是有记录的，只是内容较为简略，并不条列乡里的具体名称、沿革地理。据 P. 2005 其它条目之间的连动、互现关系来看，P. 2005 缺失部分当存在着关于敦煌县、寿昌县所辖诸乡的历史地理。《元和郡县图志》中也记录“乡”，但只是简单地说明下辖乡的数目。从 P. 2005 来看，卷一与卷二、卷四的份量亦不会简单，对乡的记录应该是非常详尽的。

P. 2005“甘泉水”条细目解释中出现子亭镇、山阙烽、马圈口堰、北府渠、神农渠、阳开渠、都乡渠、宜秋渠这些地理要素。除子亭镇、山阙烽、神农渠没有专门的条目外，其它在图经中都有著录<sup>①</sup>。“苦水”条细则解释中出现了鱼泉驿、阶亭驿、廉迁烽，其中廉迁烽没有著录。“都乡渠”条下有马圈堰，马圈堰在后文中有单独条目。“长城堰”条下有苦水，苦水在图经中有著录。“兴胡泊”条下出现了玉门关，玉门关在 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有著录。“一十九所驿站”，除常乐驿、赤崖驿分属瓜州、伊州外，不必在沙州图经中进行解释外，其它条目均是互为说明。“土河”条下出现碛口亭、白山烽、神威烽。“古长城”条下出现了阶亭烽、曲泽烽、石城。由上观之，P. 2005 在解释地理条目时，多次用到了“某某烽”、“某某镇”，但是却未对烽、镇单独列目进行说明。结合图经地理要素之间的连动、互现现象，我们认为烽、镇在图经的缺失部分中是有著录的。事实上，这一推测能通过其它材料得到证实。S. 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

1，《沙州图经卷第一》

2，第一，州。第二，第三，第四，敦煌县。第五，寿昌县。

李正宇等认为全书卷次结构是，第一卷为州卷，第二、三、四卷为敦煌县卷，第五卷为寿昌卷<sup>②</sup>。P. 2005 为沙州都督府图经之卷三部分，那么遗失的卷二与卷四部分又是记录哪些内容的呢？图经分为五卷，敦煌部分占有三卷，且 P. 2005 在解释地理条目时，牵涉了诸多烽、镇。那么烽、镇应该是 P. 2005 缺失的部分内容，此其一。其二，从 P. 2005 以及 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的篇幅来看，卷二与卷四的篇幅应当不小，所以对于烽、镇的记录应该是较为详细的，

而非像《寿昌县地境中》中仅仅是列出“镇二，龙勒、西关。戍三，大水、紫金、西子亭。烽，卅四。栅，二。堡，五”。又 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前面部分残缺，李正宇录文作：“（前缺）紫金栅，右，在县西南百一十二里，西北去五亭山××里，于山北□□烽置栅以押贼”，李正宇据《寿昌县地境》黑鼻山条位于寿昌县西南五十里延绵西至紫金，后有专门“四所山”之专记山脉的条目，且有“置栅以押贼”之语，故而推断此缺文为“紫金栅”，甚是。栅，《通典》：“为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为之”<sup>③</sup>，栅乃兵防工事，与烽、戍同属军事设置，性质类同，故而《寿昌县地境》中提及的三十四烽、三戍、二镇等也应该出现在 P. 5034 前缺部分中。图经也记录与“栅”类似的军事建制，故 P. 2005 卷二与卷四部分当是详细记录了敦煌的军事建制，这样在卷三部分提到“某某烽”、“某某镇”时亦不会显得突兀。图经地理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现、连动关系，借助这种关系可以复原 P. 2005 缺失的内容。仓修良认为唐代图经的主要内容是建置沿革、地名由来、山河走向、物产风俗民情、名胜古迹、交通要道、农田水利<sup>④</sup>。仓修良所讲图经的主要内容并未提及乡、镇、烽、戍等军事建制，然据敦煌文书来看，它们也是图经所要著录的内容。

①七所渠均是引甘泉水修建而成，条下所列为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都乡渠、北府渠、三丈渠、阴安渠，图经在叙述甘泉水水道时，夹叙北府渠、神农渠、阳开渠、都乡渠、宜秋渠，七所渠道与甘泉水水道中所记录的渠道并无对应关系。从甘泉水水道来看，图经叙述了甘泉水水道所历经的渠道，那么水道图与渠道图当绘于同一图中。而从七所渠来看，七所渠与甘泉水下的渠道并不是严格对应的，且七所渠道的叙述没有任何地理方位上的逻辑性，故而该部分或者是在多次的编修过程中受到了或增添、或删削的反复调整。在 P. 2005 甘泉水叙述中提及的神农渠并没有第二次出现，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神农渠应该是编修“七所渠”中有意删节的河渠。

②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 305 页。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88—97 页。

③[唐]杜佑：《通典》卷 152《兵五》，（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3900 页。

④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第 188—192 页。

关于 P. 2005 的分卷问题,李正宇认为 P. 2005 之前残部分为卷一卷二及卷三甘泉水以上内容,卷一为沙州卷,包括州郡建置沿革、历史要事、名宦名人事迹等,卷二为敦煌卷卷首,有总叙、沿革、窟寺、诸山、烽燧,卷三为 P. 2005,卷四也属于敦煌县部分,推测可能有 人物、遗事诗文,卷五为寿昌县内容,即 P. 5034 《沙州图经卷第五》<sup>①</sup>。李宗俊认为 P. 2005 是唐开元初经编修后的抄写本,而且 692 年撰成时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一”、695 年编修后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二”<sup>②</sup>。也就是说 P. 2005 由卷一变成卷二。影响图经分卷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条目的增减,二是对于条目解释的详略程度。P. 2005 在 692 年时有大规模的增修<sup>③</sup>。刺史李无亏增入了不少他在任期间的重要政绩。从 P. 2005 来看,李无亏所增入的条目都集中在 P. 2005 中,将 P. 2005 视为一个整体,内部并无明显分卷的痕迹,因此李无亏对于图经的增修只是扩充了 P. 2005 所在卷次卷三的规模,并没有改变它的分卷。

图经中条目解释的详略程序对于分卷有一定影响。李锦绣曾指出 S 367 《沙州伊州志》中寺二、观二、烽七、戍三与 P. 2005 中七所渠、三所泽、二所堰的写法相近,只是更为简洁,因而文书为综汇多州的《图经》,而不是地志,S 367 《沙州伊州志》是《陇右图经》的简抄本<sup>④</sup>。故从 S 367 《沙州伊州志》可以窥见晚唐《陇右图经》的样貌。S 367 《沙州伊州志》中伊州部分也有关于军事建制的信息,“伊吾县”下有云“烽七,水源、毛瓦、狼泉、香枣、盘兰泉、速度谷、伊地具。戍三,壑亭、赤崖、稍竿”,“纳职县”下云“戍一,百泉。烽八,百尺、不到泉、永安、束柘厥、花泉、延末”,又“柔远县”下曰“烽四,白望、白杨山、伊地具、独堆”,S 367 抄于光启元年(885 年)十二月廿五日,其原本当早于此。现存敦煌图经中鲜有对于烽戍的记载,除 S 367 有记录外,《元和郡县图志》中也存在不少“戍”的条目。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关于“戍”的记录是相当详细的,如宣州当涂县有采石戍,有载曰:“在县西北三十五里。西接乌江,北连建业,城在牛渚山上,与和州横江渡相对,隋师伐陈,贺若弼从此渡。隋平陈置镇,贞观初改为戍。”<sup>⑤</sup>这种详细程度与 S 367 对于戍的简化处理截然不同。又

P. 2691 《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中已经完全不见对于烽戍等这一类军事建制的著录。也就是说晚唐的图经在记录烽、戍这一类军事建置时,逐渐走向简明化。军事建制并非是图经编修的必备条目。李锦绣认为从 S 2593 《沙州图经卷第一》至 P. 2005 分卷布局有很大调整,是完全重修,而非陆续增修<sup>⑥</sup>。唐代图经对烽镇戍军事建置的记录存在着一个由详入简的变化过程。继 S 2593 《沙州图经卷第一》之后,图经所记军事建制的篇幅逐渐变得简洁短小,分卷自当随之变化。P. 2005 缺失的部分包括乡、镇、烽、戍,与之属于一体例的 P. 5034 中前缺部分为与栅类似的军事建置,故而 P. 2005 缺失的乡、镇、烽、戍这些应该存在于卷二部分。这一部分在唐前期的著录是非常详细的,卷一叙述 S 2593 的内容,卷二叙山川、乡、镇、烽、戍,卷三叙 P. 2005 的内容,这种分卷格局一直持续到开元时,至唐后期时图经对乡、镇、烽、戍的叙述逐渐走向简略,P. 2005 的分卷才开始发生变化。

## 二 《沙州归义军图经》的复原及其景观、权力

P. 2005 中地理要素在其它敦煌地志类抄本中也有出现,而且这些信息在不同的地志类文中也呈现出较为稳定的文本状态。自然地理信息相对稳定,只有置于长时段视野下时才能揭示出缓慢的变化。故而在编修图经时,自然地理并不总是需要重新撰写,在没有大的变动时,因袭已有条目即可。图经中的人文信息则大不相同,它们与人事紧密相关,变动较为频繁。在讨论图经的增削变化前,我们先对敦煌

①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 42 页。

②李宗俊:《〈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 年第 1 期,第 58 页。

③李宗俊:《〈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 年第 1 期,第 55—56 页。

④李锦绣:《地理类》,收入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512—513 页。

⑤[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28 《江南道四》,第 684 页。

⑥李锦绣:《地理类》,收入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第 508 页。

主要的几份地志类文书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李正宇认为 P. 5034 与 P. 2005 同属一个系统，而与《沙州伊州志》、《寿昌县地境》、《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不属于同一系统；《沙州志》与《沙州伊州志》属于同一系统，《沙州志》是《沙州伊州志》的转抄、校补本，与《元和郡县图志》不属同一系统；《寿昌县地境》是《沙州伊州志》、《沙州志》关于寿昌县部分的简编本，《沙州志》无图<sup>①</sup>。换言之，P. 5034 与 P. 2005 是一个系统，有图；《沙州志》《沙州伊州志》《寿昌县地境》是一个系统，无图；

《元和郡县图志》是一个系统，有图。《沙州志》《沙州伊州志》《寿昌县地境》无图，理由是文书并“没有透露出附有地图的任何信息”<sup>②</sup>。李正宇指出 P. 2005 与 S. 367、S. 788 不属于同一系统，但是 S. 788《沙州志》“悬泉”条的缺文又是据 P. 2005 所补<sup>③</sup>。故所谓“不属同一系统”是从体例上进行的划分，并非史料来源。李锦绣对 S. 367《沙州伊州志》的母本问题进行探讨，认为 S. 367 来自于《陇右图经》。结合李正宇、李锦绣的研究，可以将地志类文书间的关系表示成如下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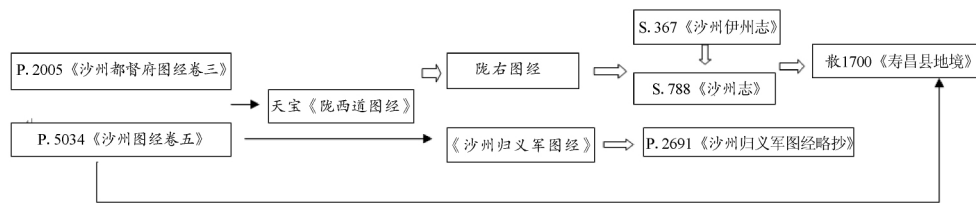


图1 敦煌地志类文书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李锦绣《地理类》，收入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第514—515页。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214、325、257页。

李锦绣与李正宇所揭出的关系用双箭头表示，本文揭出的关系用单箭头表示。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与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散1700《寿昌县地境》、S. 367《沙州伊州志》均对寿昌县进行了记录，不难发现，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所记寿昌县条目最为全面，除《寿昌县地境》所记录的沮末河条未见于P. 5034及其他三份文书外，四份文书所记条目均未能溢出P. 5034的范围。P. 5034的母本特点非常明显。与P. 5034同属一系统的P. 2005也是叙述沙州历史地理重要的母本。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S. 367《沙州伊州志》、S. 788《沙州志》中敦煌部分均能在P. 2005中找到对应条目。从图经所记内容的详尽程度上来讲，它涵括地理条目之全面也是其余地志类文书无法企及的。因而从这个层面来讲，图经是原始地理知识的材料汇编，是其它地志类文本编修时所需要参考的重要史料。故P. 2005与P. 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是天宝《陇西道图经》《沙州归义军图经》的史源之一，当无疑问。

李正宇将P. 2691定性为《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该卷卷末有“至今大汉乾祐二年己酉岁”之语，因而此卷为乾祐二年（949年）编修的沙州归义军军州地志<sup>④</sup>。也就是说归义军曹元忠时

也还编修过沙州图经，可简称为《沙州归义军图经》。据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中寿昌县部分，存目如下：黑鼻山—姚闾山—龙勒山—西紫亭山—大泽—曲泽—龙勒泉—龙堆泉—寿昌海—大渠—石门涧—无卤涧—玉门关—破羌亭。李正宇认为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的抄写者“只是按照个人意愿选抄自己需要的条目及内容”<sup>⑤</sup>，若如此，那么将难以顾及图经内部的统一性。与之矛盾的是P. 2691内部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各地理要素之间存在明显的互现、连动关系。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保留了原图经的纲目，省略了细则，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地理大纲进行解释的细则在长时段下基本维持着较为稳定的文本状态，故而我们可以将P. 2691省略了的细则与P. 2005、P. 5034的细目

①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157—158、215、325页。

②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238、214、215页。

③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217—218页。

④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256—257页。

⑤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255页。

内容大体等同。P. 2005 北盐池条有云，“其盐不如西池，与州东盐池味同”，北盐池与东盐池、西盐池为连动关系。兴胡泊条曰，“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兴湖泊与玉门关为连动关系。P. 5034 寿昌海条下载，“其水分流二道：一道入寿昌南溉田；一道向寿昌东溉田。旧名渥洼水”，又大渠条，“从渥洼海畔穿渠，用溉县东田苗”，寿昌海与大渠是连动关系。这三组连动关系在 P. 2691 中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可见 P. 2691 内部也是高度统一的，这绝非是抄写者按个人意愿进行编排的结果，P. 2691 只是对《沙州归义军图经》细目的节略，而非针对大纲<sup>①</sup>。故而我们可据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还原《沙州归义军图经》。

锁定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与《沙州归义军图经》的关系后，那么曹元忠时期编修的《沙州归义军图经》中敦煌部分当有存在这么一段条目，即沙州城—甘泉水—贰师泉—东盐池—西盐池—北盐池—玉女泉—兴胡泊—阌冢—河仓城—长城—塞城—效谷城—土地神—雨师神—风伯神—李先王庙—张芝池。将之与唐前期的 P. 2005 中敦煌部分对比，为清眉目，制作表格如下<sup>②</sup>。

表 2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与《沙州归义军图经》条目对比

唐前期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	后汉乾祐二年(949)《沙州归义军图经》	被删节的条目
甘泉水、苦水、独利河水、悬泉水、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都乡渠、北府渠、三文渠、阴安渠、壕堑水、东泉、泽、卍里泽、大井泽、马圈口堰、长城堰、故堤、殿、碱卤、东盐池水、西盐池水、北盐池水、兴胡泊、十九所驿、州学、县学、医学、社稷坛、土地神、风伯神、雨师神、袄神、异怪、李先王庙、孟庙、阌冢、嘉纳堂、靖恭堂、谦德堂、土河、古阿仓城、古效古城、古长城、古塞城、张芝墨池	沙州城、甘泉水、贰师泉、东盐池、西盐池、北盐池、玉女泉、兴胡泊、阌冢、河仓城、长城、塞城、效谷城、土地神、雨师神、风伯神、李先王庙、张芝池	苦水、独利河水、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都乡渠、北府渠、三文渠、阴安渠、壕堑水、东泉泽、卍里泽、大井泽、马圈口堰、长城堰、故堤、殿、碱卤、十九所驿、州学、县学、医学、社稷坛、袄神、异怪、孟庙、嘉纳堂、靖恭堂、谦德堂、土河

据《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931年)吏部侍郎王权奏请诸道重修图经，“其间或有古

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sup>③</sup>，这次图经编修所须备载的具体条目现在已经不太清楚。通过复原归义军曹元忠时期的《沙州归义军图经》，不难发现图经著录条目发生了很大变动，唐前期沙州图经中的条目并没有出现在归义军曹元忠时期的图经中。唐前期 P. 2005 中“七所渠”、“一所壕堑水”、“三所泽”、“一十九所道路”等诸多地理条目在《沙州归义军图经》中被予以删节。李无亏任刺史期间于 692 年增入了水利设施、驿道建设条

<sup>①</sup>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中有长城条，据图经地理要素之间的互现关系，P. 2005 长城条下载：“东至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可知 P. 2691 对烽这一类的军事建制进行了删节。然这并非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对《沙州归义军图经》的删节，而是图经本身发展到后来对于军事建制的简化处理。又 P. 2691 有黑鼻山条，其细目据 P. 5034 有云：“东接县南沙山，其沙山东至山阙洞即绝。其黑鼻山连延西至紫金，即名紫金山，至五音，亦名五亭山”，山阙洞与山阙烽毗邻，而山阙烽见于甘泉水条下细目。军事建制在唐后期的图经中又常作简化处理，故而 P. 2691 中黑鼻山亦是与图经内部相协调的地理大纲。五亭山不见于沙州图经中，当不属于管辖范围。由此可见，P. 2691 内部各地理要素之间确实有着相当严密的互现关系，这绝非抄写者按自己意愿随意选抄所致。

<sup>②</sup>关于 P. 2005 的时间问题，李宗俊在《〈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一文中曾有该文书的年代问题争议点进行较为详细的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池田温在《沙州图经略考》一文中，认为 P. 2005 是在上元三年(676年)至证圣元年(695年)近二十年之间不断编修，至武周证圣元年、开元初又陆续有增修，直至永泰二年(766年)沙州升为都督府后改称《沙州都督府图经》，李宗俊基本同意池田温所提出的图经是不断续修思路，但不同意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是永泰二年，而是《唐会要》所记永徽二年(651年)，他认为图经撰成于武周长寿元年(692年)，在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与开元初年(719年)年有两次修补。随后刘安志在《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59—66页。)一文中借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的记载确认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以永泰二年五月为确，而非永徽二年。故而本文对 P. 2005 的年代问题依池田温说法。

<sup>③</sup>[宋]王溥：《五代会要》卷15《职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4页。

目<sup>①</sup>。这些昭示李无亏个人成就的政绩景观在曹元忠时期重新编修《沙州归义军图经》时都被一一删除。长城堰“在州东北一百七十里，堰苦水以溉田”。“苦水”在 P. 2005 中也有专门条目记录。而《沙州归义军图经》中既无苦水条，也无长城堰条，这并非无意的编目疏漏，而是有意将长城堰删节了。长城堰乃沙州刺史李无亏所修，“承前造堰不成，百姓不得灌溉，刺史李无亏造成，百姓欣庆”。李无亏在任期间长城堰的修造是一件重要政治功绩，这一堰坝得名于武则天的赐名。苦水与长城堰是两条连动条目，在讲述长城堰时，必须对与堰坝关联的苦水进行描述，故而在 P. 2005 水系部分著录了苦水。至曹元忠时，已经不再需要褒扬长城堰的修造者李无亏，那么苦水亦无编修之必要。故而《沙州归义军图经》中，连同苦水在内的这一些人文景观也都一并被删除。

图经地理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现关系，借助这种关系也可以挖掘图经编修过程中的增删特点。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与归义军曹元忠时期的《沙州归义军图经》进行对比，后者并没有记录祥瑞，故而除了代表地方文化特色的李先王庙还得以保存外，与祥瑞相关的地理条目石城镇、靖恭堂、嘉纳堂在《沙州归义军图经》中被删除。这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三所堂”中有两所堂均与祥瑞有关，《沙州归义军图经》中已经不再记录祥瑞，靖恭堂、嘉纳堂亦无存目之必要，仅存的谦德堂在唐前期时就已经“并除毁”，降至归义军时期，亦无存目之必要了。谦德堂不存目，“谦德堂。右，按《西凉录》：凉王李暹建以听政。其堂在子城中恭德殿南”，与谦德堂相关的是“恭德殿”，谦德堂在《沙州归义军图经》中无存目之必要，著录于 P. 2005 中，“一所殿。……右，在子城中，近城南门。据《西凉录》：凉王李暹，庚子年建造此殿以听政”，恭德殿当正是“一所殿”，即便“至今见在，州司以为馆”，在《沙州归义军图经》中也不复存目，被一并删除了。

《沙州归义军图经》中被抹掉功绩的官员并非只有李无亏。孟授渠由敦煌太守孟敏所修，阳开渠、北府渠由刺史杨宣所修，阴安渠由阴澹所修，大井泽由破羌将军辛武贤所造。《沙州归义军图经》将这些条目都做了删减处理。但是“阚冢”、“李先王庙”、“张芝池”却被长期的保留下

来了。阚骝博通经传，以诗书传家，著《十三州志》，典校经籍诸子，为西土名士<sup>②</sup>。阚氏家族在隋唐时已经湮灭无闻，在敦煌绝非大族。敦煌李氏是十六国时期兴起的的地方大族，唐前期时，李氏并不显于当时，至归义军时期李氏当政又再次崛起。阚冢、李先王庙实乃是以地方名士的角色而进入图经。

敦煌张氏自汉唐以来都是地方上富有实力的老牌大族，但是张芝墨池进入图经的时间较晚。P. 2005 中张芝墨池条云“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与其它条目以沙州为参照中心迥异，此条当是开元年间杜楚臣、赵志本任时所增修。开元二年时，沙州刺史杜楚臣有意对墨池进行宣传，“寻坟典、文武俱明，访睹此池，未获安措”，然而并没有寻得合适的办法。将张芝墨池宣传成为地方文化特色的是敦煌县令赵志本，“其令博览经史，通达九经，寻诸古典”，最为关键的是开元四年九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于是令张氏家族子弟“修葺墨池，中立庙及张芝容”，方使张芝墨池成为沙州的特色景观。从张芝墨池条来看，人文景观进入图经也与地方官员的努力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芝墨池既是一种人文景观，也是政绩景观。

此外，《沙州归义军图经》与 P. 2005 相比，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玉女泉的增入。玉女泉在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S 788《沙州志残卷》、S 5448《敦煌录一卷》中均作为单独的条目列出。这些文本对玉女泉故事发生的时间以及内容的记载各有差异。S 5448 的记载较为详细，生动的描述了张孝嵩斩龙首，诣阙进上，获赐龙舌张氏的故事。S 788 讲述了贞观年间刺史张孝嵩铸铁镇龙穴之事。玉女泉在“州西北一百八十五里”，而兴胡泊“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古阿仓河城在州西北二百四十里”，从地理位置来说，玉女泉位于兴胡泊、古阿仓城之间，玉女泉不可能被忽略。从时间上来讲，张孝嵩斩龙事的时间有贞观说、

<sup>①</sup>李宗俊：《〈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56页。

<sup>②</sup>《魏书》卷52《阚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59页。

神龙说、开元三年说、开元中说<sup>①</sup>。开元四年赵志本上任之后，曾对图经有过一次修订<sup>②</sup>，亦没有提及时张孝嵩之事。因此，玉女泉无论是它所处的地理方位，还是张孝嵩斩龙故事发生的时间来说，都不应该被 P. 2005 编修者忽略。那么何以在唐前期的图经中并没有得到著录呢<sup>③</sup>？事实上，图经需要著录却付之阙如并非只有玉女泉这一个地理条目。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监牧，羈縻州，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郡县城，关铲津济，岳渎，铁，碑碣，名人，忠臣孝子，节妇列女，营垒，陵墓，台榭，邮亭，矿窟，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屯田。右，当县并无前件色。”所谓“并无前件色”并不属实，名人、沙州郡县城、邮亭、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敦煌均有相关史事，从图经编修技术角度来讲，都可以进行编目，然而图经没有进行著录<sup>④</sup>。P. 2005 中的缺目内容，如名人、沙州郡县城、邮亭、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等，在唐中期沙州图经的历次修订中也都没有加以补充。图经的增修并不力求是否完成中央所规定的既定条目。将玉女泉与 P. 2005、《沙州归义军图经》对比来看，后者不仅删掉了唐前期沙州刺史及其他官员的政绩景观，还增添了玉女泉的景观。李正宇认为玉女泉进入图经与张氏家族主政有很大关联<sup>⑤</sup>。此说甚是，玉女泉得以进入《沙州归义军图经》、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S 788《沙州志残卷》，与其说是家族景观，不如说是张议潮、张淮深时期的政绩景观。

还可以与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沙州归义军图经》进行对比的是《元和郡县图志》。《元和郡县图志》“敦煌县”下有条目三危山、鸣沙山、悬泉水、盐池，其所著录内容与前两者差异较大<sup>⑥</sup>。从唐前期 P. 2005 到《元和郡县图志》，再到《沙州归义军图经》，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级别图经内容的变动。《元和郡县图志》是全国性的图经，而另外两者则是地方性图经，前者所择条目数量少，精炼简明，地方官员的政绩景观以及反映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很难以进入全国性图经的。

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内部存在着严密的互现、连动关系，这说明该份略抄只是省略了对条目的释文，而非条目本身，换言之，P. 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保留了大纲，省略了细目。故而据 P. 2691 可以还原《沙州归

义军图经》。将之与唐前期的 P. 2005 对比，图经中增删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地方官员的政绩景观，政绩景观于官员在任期间进入图经，随着官员的更替流动，政绩景观随之而发生变化。这又从侧面说明，虽然州县图经历经多次编修，但是编修的重点之一是增入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相关的景观。图经历次编修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结构。

### 三 图、经的关系与功能

《元和郡县图志》云：“起京兆府，隶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sup>⑦</sup>，故王庸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仍然保留着旧式图经一图一说的体例，但实际上是图少说多的总地志<sup>⑧</sup>。余欣也这样写道：“根据精心拣选而存留在写卷上的地名、方位和里距，我们却不难绘制出一幅略显粗疏的沙州及其周境的地理方位图。……《略抄》为其书写者、阅读者提供了一份相当直观的瓜沙地理图景。”<sup>⑨</sup>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潘晟认为“唐代地图

①高启安：《敦煌玉女神话及张孝嵩斩龙说》，收入俄军、杨富学主编《信仰与生活——唐宋间敦煌社会诸相探》，（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77—208页。

②李宗俊：《〈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53—58页。

③唐代图经记录神异事迹乃是常事。赵贞从《太平广记》中辑出19条《图经》的神异故事，认为“古老相传的旧闻佚事和神异灵验故事”也是图经编纂时常用到的材料。唐宪宗时，李吉甫有云，“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93页。[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第2页。

④这一点李正宇先生早已经指出，参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126页。

⑤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223页。

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第1026页。

⑦[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第2页。

⑧王庸：《中国地图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32页。

⑨余欣、钟无末：《中古敦煌民众的世界图像建构》，陈金华、孙英刚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3—194页。



与图经为各自独立之文献，图经更多的是独立于地图的文字性文书”。<sup>①</sup>可见，图与经的关系受到了学者们的诸多关注。从文书中地理条目的叙述规律来看，P. 2005 确是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图，并且据“经”之描述也可以还原出“图”。P. 2005 叙三所泽条，东泉泽、卅里泽、大井泽是从东往西，由北往南记录。三所盐池水条，所叙东盐池水、西盐池水、北盐池水是从东往西记录。一十九所驿条，所叙州城驿—清泉驿—横涧驿—白亭驿—长亭驿—甘草驿—阶亭驿是从沙州城自西往东记录。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是由北向南记录。其头驿—悬泉驿—鱼泉驿是从西往东记录。无穷驿—空谷驿—黄谷驿是从西往东记录。四所杂神，土地神—风伯神—雨师神—祆神是从南至西北再至东记录，顺时针方向。三所堂，嘉纳堂—靖恭堂—谦德堂是从东北至西南再至南记录，逆时针方向。四所古城，古河仓城—古效谷城—古长城—古塞城是从西往东、由北往南记录。除了一十九所驿站记载的地理参照坐标是驿站外，其它的都是以沙州城为参照坐标。经在表述地理条目时依特定有序的空间关系进行有规律的描述。

图经在编修时尽量寻找可以参照的方位，确定地物关系。每一个地理条目的位置均可以从参照物方面得到确定，这一点在 P. 5034 《沙州图经卷第五》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沙州图经卷第五》与 P. 2005 有很大不同。后者只有一个参照中心，云“在州东（南西北）……里”，而前者除“在县东（南西北）……里”之外，提及石城镇、石城南山、屯城、新城、蒲桃城、萨毗城、蒲昌海时，又云“在石城镇东（南西北）……里”。图经在叙述时总是试图寻找合适的参照中心，借助道里来确定地物的位置。

地方上出现祥瑞，便需呈表文上奏，那么祥瑞是否有“图”。据《唐要会》：“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合大瑞者，随即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命，具图书上进”<sup>②</sup>。祥瑞的上奏不仅有简短的文字表述，也还有图。“元和二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异兽等，准永贞元年八月敕，自今以后，宜并停进者”，至元和二年（807 年）时，曾拟定祥瑞不再上奏，然“恐阙于盛礼”，“准仪制

令。其大瑞即随表奏闻。中瑞下瑞，申报有司。元日闻奏。自今以后。望准令式。从之”<sup>③</sup>，P. 2005 在编撰时，祥瑞部分应当也是有图的。

“城”没有对应的图。P. 2005 云，“一所殿，在子城中，近城南门。……至今见在，州司以为馆”，又“州学，在州城内，在州西三百步”，一所殿在子城中，州学以及县学、医学均在城内，即“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除此之外，三所堂也在城内，嘉纳堂，在子城东北罗城中，谦德堂，在子城中恭德殿南。同样，寿昌城，亦是如此，据 P. 5034 《沙州图经卷第五》，县学，在城内，县西南五十步。城内的地理条目也被记录在图经中。但是这并不代表沙州城内的地理格局，也会被绘制成图，其一，三所堂，嘉纳堂、靖恭堂、谦德堂，没有明确标示方位，这与其它地理条目很不一样，不标示东西距离，难以确定位置，无法制图。故这三所堂应该没有出现在“图”中。其二，P. 2005 与 P. 5034 中位于城内的地理条目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寿昌县，只有县学是位于寿昌城内。因此，P. 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图”的部分并没有完全将“经”中提到的所有条目全部逐一绘制。又如，有些遗址已经不复存在了，无法标识位置。但是经还是将它们记录在内。三所堂下记载了嘉纳堂、靖恭堂、谦德堂，其中靖恭堂“基尚存”，而谦德堂“在子城中恭德殿南。今并除毁”。图并没有将经中所记录的条目全部绘制，经比图要更详细、更丰富。

城隍、镇戍、烽候另外有图，故而图经中对于镇戍、烽候的记载较为简略。元稹撰《京西京北图经四卷》后，认为“诸家所进《河陇图》，勘验皆有差异，并检寻近日烽、镇、城、堡不得，……伏缘臣先画《西极图》，……若烽、镇、馆驿尽言，即山川榜帖太密，……愚臣数日之间，别画一《京西京北州镇烽戍道路等图》已毕，纤毫必载，尺寸无遗。”<sup>①</sup>元稹将京西京北的州镇、烽、戍、道路单列一图进献，这表明图经

① 潘晟：《图经源流再讨论》，《中国地方志》2010 年第 1 期，第 29 页。

② [宋] 王溥：《唐会要》卷 28 《祥瑞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第 531 页。

③ [宋] 王溥：《唐会要》卷 29 《祥瑞下》，第 537 页。

的编修成例中,镇、烽、戍等军事建制是需要画列其中的。其图既可以与山川水道共处一图,也可以单独成幅。“经”中有些地理要素并没有绘于图中,这是“图”相比于“经”而言所存在的缺陷之一。

图在对经进行绘制转译时,也存在着功能性的欠缺。图经的修订与彰显官员政绩存在着一定关联,“经”以文字的形式将他们所需要宣传的景观进行修辞描述,昭示景观与权力的关系,而“图”在转写时,只能简单地标识名称方位,无法将与景观密切相关的权力带入“图”的情境中。“图”对于权力关系的展示存在着功能性的欠缺。“经”与“图”在表述权力与景观时的效果差异十分显著。图经中有些地理单元与人名有关系,如孟授渠、阳开渠、阴安渠、长城堰、阡冢、张芝墨池,它们在转绘成图时,通过标写名称榜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权力关系。然而有些地理单元的名称与人名无关,如果只是在图中简单地标识,无法凸显该地理名目背后的权力。比如图经中的道路交通,P.2005中记载了“一十九所驿”,清泉驿、甘草驿、阶亭驿等乃李无亏所建,横涧驿、白亭驿、长亭驿等乃陈玄珪所建,这些信息通过“经”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经”转译成“图”后,无疑就遮蔽了驿站背后的权力主体,即两任沙州刺史李无亏、陈玄珪。又如祥瑞,“诸祥瑞应见,……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所在官司案验非虚,具图书上。”祥瑞之图旁也有文字榜贴,然而只能标注名目与出处。这样P.2005中与李无亏相关的祥瑞五色鸟、日扬光、庆云、蒲昌海

五色、白狼,在转译成图时,李无亏对于武则天的颂扬则难以体现。图的表述能力在这个层面上是欠缺的。

#### 四 结 论

隋唐图经的兴盛与刺史需要迅速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状况有着紧密联系,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图经最初兴起的原因。然而,从敦煌图经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图经的编修过程中往往还孱入了刺史在任期间的政绩景观,因此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以P.2005为例来看,图经是州刺史宣扬政治功绩的重要场所。图经的编修过程中代表地方名士、大族的人文景观与代表官吏的政绩景观是最为活跃的修撰要素。前者历经多次修撰还能继续在图经中作为重要的地理景观存目,如李先王庙、阡冢,而政治家所塑造的景观,如敦煌郡守刺史主持修建的孟授渠、阳开渠、阴安渠、长城堰,各色祥瑞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其它地理要素,在图经中的持久久远不如前者。政绩景观很难进入全国性的图经中,且往往会随着图经的历次编修而逐渐删除。“经”扮演着“图”所不能胜任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还承载着地方官员宣传政绩的作用。

(本文曾在长安中国中古史沙龙第十三期宣读。李宗俊、裴成国、冯培红、宋翔对于本文给予了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①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51《元稹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607—6608页。

### The Landscape and Power of Dunhuang Maps

Wang Jing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There wer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geographical elements of P.2005, by which we can restore the missing part of P.2005 and the “Sha Zhou map of the Guiyijun”. Two obvious change parts in the compilation of Dunhuang map, one was the achievements of officials, and the other was local cultural landscape. As constant revision of the map,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gradually receded, and the human landscapes survived for much longer time. “Map” failed to draw the whole geographical, nor to express the power relations with the Jing. The function of “Jing” to 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local society was impossible to achieve by “map”.

**Key Words:** map; political landscape; human landscape; power